

2007卷(第1辑) (总第12辑)
No. 1 2007

政治经济学评论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 郭金兴 柳欣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中国经济高增长方案的初步论证
- 丁守海 劳动剩余与工资上涨条件下的工业化
- 于同申 人民币需谨防四种陷阱——论人民币升值压力下的宏观经济管理
- 岳宏志 寇雅玲 生产劳动理论的一个全新研究——兼评中国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观点
- 王璐 货币理论的争论与解析
- 王生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
- 张建君 论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及影响
- 吴宇晖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
- 胡代光 转形问题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解法——读《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一书
- 张宇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述评(2001-2007)
- 刘明远 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 郭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科学探索
——解读卫兴华、张宇教授新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2007卷(第1辑)

No. 1 2007

政治经济学评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7 卷. 第 1 辑: 总第 12 辑/柳欣, 张宇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300-08552-4

I. 政…
II. ①柳…②张…
III. 政治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7779 号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7 卷 第 1 辑 (总第 12 辑)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0 mm×25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17.75 插页 1	印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4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出 版 说 明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由于它所具有的科学、知识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而被誉为社会科学的皇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启蒙思想、传承文明、推进科学和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反映国内外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动态，探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推动国内外政治经济学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学科的繁荣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决定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政治经济学评论》系列文集。本文集的思想是：尊重政治经济学的优秀传统，同时对现代经济学的新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注重基础理论的发展，同时重视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倡兼容并蓄，并期望在不同学派和理论的对话中寻求政治经济学新的主流；鼓励科学创新，同时崇尚严谨学风，追求学术规范。希望本文集的出版能得到学术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支持。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2002 年 10 月

目 录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

——中国经济高增长方案的初步论证 郭金兴 柳 欣 / 1

劳动剩余与工资上涨条件下的工业化 丁守海 / 31

人民币需谨防四种陷阱

——论人民币升值压力下的宏观经济管理 于同申 / 59

生产劳动理论的一个全新研究

——兼评中国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观点 岳宏志 寇雅玲 / 79

货币理论的争论与解析 王 璐 / 11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工资理论 王生升 / 147

论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及影响 张建君 / 169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社会主义 吴宇晖 / 184

转形问题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全新解法

——读《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一书 胡代光 / 195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述评（2001—2007） 张 宇 / 207

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刘明远 / 22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科学探索

——解读卫兴华、张宇教授新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郭 毅 / 271

Contents

Economic Growth, Structure Regulation, and Labor Force Movement: A Primary Test of the Scheme of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with High Speed	Guo Jinxing, Liu Xin / 1
Industrialization under the Condition of Labor-surplus and Wage-rise	Ding Shouhai / 31
Bewaring of Four Traps for RMB;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under the Pressure of RMB Appreciation	Yu Tongshen / 59
A Completely-New Study on Productive Labor Theory ——Some Remarks on Viewpoints of Productive Labor Problem in Chinese Economists	Yue Hongzhi, Kou Yaling / 79
Controversies and Explanations of Monetary Theory	Wang Lu / 113
The Theory of Wage in Marxist Economics	Wang Shengsheng / 147
On Hayek's Economic Ideology and It's affect	Zhang Jianjun / 169
Marxian's Socialism and Market Socialism	Wu Yuhui / 184
A New Marxist Solution of Transformation Problem; Book Review of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s	Hu Daiguang / 195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Work of Marxism Plutonomy b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Zhang Yu / 207
The Retrospect of the Theory of Chinese Socialism Economy Period	Liu Mingyuan / 228
The Scientific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etic System of the Socialism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Review of Prof. Wei Xinhua and Zhang Yu's "The Socialism Economy Theory"	Guo Yi / 271

经济增长、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方案的初步论证

郭金兴 柳 欣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说明我国经济在保持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在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之间形成了累积循环机制，结构性失衡日益严重，不利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和城市部门的转移，并且在长期将危害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用 15—20 年基本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本文是对这一高速增长方案的初步论证。

作 者 郭金兴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柳 欣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一、引 言

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是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事件，而且这一奇迹仍在继续，还远未结束。自 2002 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呈现低通胀、高增长的良好态势，然而，在总量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结构性问题日益凸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有良好的经济结构为支撑，但是目前在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收入分配、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产业结构以及内需与外需之间均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这突出表现在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大规模的新增就业机会，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呈现不一致性。考虑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号：05JJD790017）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号：06&ZD02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南开大学博士生冯素杰、王洋、尹碧波、张宁、张颖熙、张楷驰、张鹏、王晨参与了本文部分内容的撰写。

到我国目前仍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尚未完成,仍有 40% 的就业人口从事低效的传统农业,60% 的人口生活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在非农部门和城市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加快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结构转型,应是宏观经济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唯此才能实现使更多人口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目的,在经济增长中实现公平与和谐。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存量与流量、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就业之间存在着累积循环效应。存量与流量的比例上升导致收入分配向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倾斜,而不利工资收入者,从而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随着收入分配差距的增加,需求结构和消费结构倾向于资金密集型的生产资料部门和奢侈品部门,这些部门的快速发展带来经济总量的扩张,但创造较少的就业机会,并且使工资水平上升,而工资的行业差距增加,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同时,增加这些部门的投入使得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结构更加失衡。结构性问题之间的累积循环机制使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更为突出,甚至导致结构性矛盾固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最终不利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这些结构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二元结构,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尽快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实现经济结构转型。但是,以目前的发展趋势,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至少还需要大约 40 年的时间。本文试图提出一种经济高速增长方案,将这一进程缩短到 15 至 20 年。

本文除引文外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问题,重点在于说明这些结构性问题之间存在的累积循环机制,讨论经济高速增长方案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构建理论模型,进行经验研究,论证经济高增长方案的可行性;第四部分分析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提出增长方案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

本文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快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旨在说明经济高增长方案的必要性。本文将目前经济运行中主要的结构问题归纳为相互联系的五个方面,即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结构失衡引起的“滞胀”问题;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的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的总需求结构中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问题;产业结构发展失衡问题;内需与外需结构失衡问题。合理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结构问题必须联系到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经济发展初期,落后的二元经济结构需要以投资和出口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因此,投资和出口在经济中比重持续上升。持续高速的投资导致资本存量不断上升,使存量和流量的结构逐步失衡。资本存量的上升还导致财产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比重增加,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增加。收入分配状况决定了需求的结构,一方面导致投资需求旺盛而消费需求不振;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的奢侈品部门和生产资料部门倾斜,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这样的产业结构可以实现总产出持续增长和部分富裕阶层收入的迅速提

高,但是不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呈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不利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经济结构转型。实际上,以上结构问题已经形成了循环累积机制,经济二元结构转型缓慢甚至呈现恶化的趋势。通过经济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是解决当前严重的结构问题的根本途径。

(一)“滞胀”问题

在传统的理论中,所谓“滞胀”是指物价上涨较快,而实际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和经济衰退,同时伴随着失业率的上升。美国及世界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在战后采取了以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带来了经济持续较快增长,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西方世界的“黄金十年”。但是在随后的70年代,“滞胀”问题成为西方国家难以治愈的顽疾,直至80年代紧缩性的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方使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回到正常的轨道。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经历的“失落的十年”。日本同样是在经历了长期持续快速经济增长之后,增长率出现了急剧下降,失业率上升,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但没有出现通货膨胀,而是呈现通货紧缩的趋势。我国自2002年以来的经济运行呈现不同的特征,经济高速增长,物价水平温和上升,但产出的就业弹性持续下降,经济增长并没有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

美国的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20世纪90年代和我国目前经济运行表现的特征有所不同,但是本质都在于资产存量 and 收入流量的结构失衡。在正常的经济周期波动中,经济高涨时期投资旺盛,资产存量迅速增加,导致功能性收入分配向财产性收入(租金和利息)和经营性收入(利润)倾斜,工资性收入比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增加导致消费需求比重下降,但旺盛的投资需求弥补了消费需求的不足,这时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比例上升。但是,随着经济持续高涨和资产值的持续上升,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扩大,最终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经济衰退。在衰退的过程中,资产贬值使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结构恢复到正常水平。因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使得资产存量和收入流量在长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例,这是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但是,旨在保障经济稳定增长的凯恩斯政策却会破坏这一自发的调节作用,使资产存量和收入流量之间出现结构性失衡,即资产存量增长速度超过收入流量增长速度,使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例不断上升。存量与流量结构失衡是美、日、中三国在不同时期的经济运行的一致特征。我们将存量和流量的这一结构性失衡称之为“滞胀”。

由于在目前的统计中没有全社会全部资产存量的数据,我们采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分析我国近些年来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比例的变化。房地产是全社会存量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缺少全国房地产市场存量总值的统计,考虑到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耐用品,我们以全国商品房销售收入作为房地产存量价格变化趋势的代表性指标。我们以商品房销售收入与名义GDP之比作为分析房地产存量价值与收入流量结构变化的替代性指标。在1991年,商品房销售收入在当年GDP中仅占1%,而在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6%,即使考虑到住房制度改革对于商品房销售的影响,这一比例的上升也是非常显著的。实际上,2000年以来,在住房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以后,商品房销售收入与名义GDP的比例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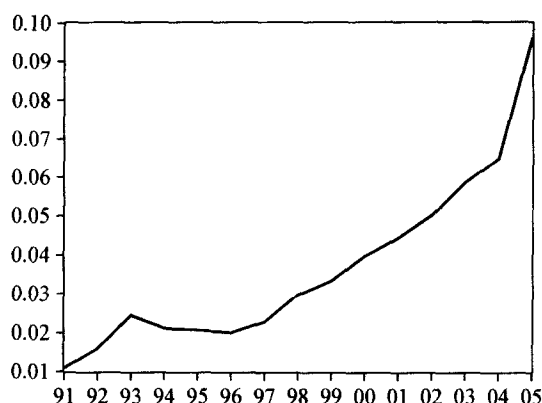


图 1 1991—2005 年商品房销售额与名义 GDP 之比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6《中国统计年鉴》相关资料整理。

除了总量外，还可以比较存量价格和流量价格的变动。商品房价格指数、住宅价格指数和土地交易价格指数反映了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反映了收入流量的价格变动。自 2000 年以来，房地产价格一直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在 2002 年之前两类指数的上涨幅度相差不大，但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房地产价格增幅远远超过了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化，尤其是土地价格上涨更快。这反映了房地产资产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例在迅速上升。

表 1 2000—2005 年居民消费价格与房地产价格比较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商品房价格指数	住宅价格指数	土地交易价格指数
2000	100.4	100.8	101.4	100.2
2001	100.7	101.8	101.9	101.7
2002	99.2	103.4	104.0	106.9
2003	101.2	105.0	105.7	108.3
2004	103.9	109.0	109.4	110.1
2005	101.8	107.7	108.4	109.1

资料来源：2001 年各类房地产价格指数来自于 2002 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余数据来自于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表中的价格指数以上年为 100。

(二)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不一致性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劳动作为一种要素投入被纳入单调递增的生产函数，就业增长越快，则产出增长也越快，因此，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是高度正相关的。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就业弹性平均在 0.3~0.4 之间。但是中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今十余年的经验却与此相反：经济增长率长期在 9% 以上，但就业增长一直低于 1.5%。1991—2001 年我国平均 GDP 增长为 9.9%，而平均就业增长只有 1.2%，直接计算的就业弹性只有 0.124，也正是在这段时间，我国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国正处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时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实现这种转型所必需的劳动力转移，而劳动

力转移显然只能靠二、三产业的就业来实现,农业即便就业再多,对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分析的焦点应该集中在二、三产业经济增长能否带动二、三产业就业的较大增长上。我们按这个思路给出了 1993 至 2005 年间的二、三产业实际 GDP 增长与就业增长曲线。13 年间二、三产业平均 GDP 增长约为 13.2%,平均就业增长只有 3.3%,就业弹性为 0.25,总体是比较低的,特别是 1997 到 2003 年间,二、三产业 GDP 增长处于 10%以上,就业增长却相当低,可以说用经济增长带动劳动力转移的目的没有较好地实现。

按照要素收入法核算的 GDP 由工资、盈余、折旧和税收等项目构成,根据工资基金理论,名义 GDP 中的一部分作为工资基金,它除以平均货币工资率即为就业量。因此可得到:

$$EMP = \alpha \times GDP \times DLS / WAG \quad (1)$$

其中 EMP 为就业量;GDP 为名义国内生产总值;DIS 为 GDP 中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比例,这一比例反映了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状况;WAG 为平均货币工资率; α 为系数。这里我们没有考虑价格因素的影响,因为公式中的 GDP 和 WAG 都是名义值而不是实际值,表达的是一个货币量。

对于上述公式我们先检验一下是否在数值关系上成立,再来讨论其经济含义。对 (1) 式取对数可以得到:

$$\ln EMP = C + \ln GDP + \ln DLS - \ln WAG \quad (2)$$

我们用中国中东部二十个省份从 1993 年到 2003 年的面板数据来对 (2) 式进行估计,其估计结果如 (3) 式所示,其中,GDP、WAG、EMP 的单位分别采用亿元、万元、万人。从估计结果看,就业与以上三个因素高度相关,拟合度尚可,该公式在数值关系上基本成立。根据估计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GDP 每增长 1%,就业量增长大约为 1%;劳动分配份额每增长 1%,就业量增长约为 1.5%;平均工资每增长 1%,就业量下降约 1%。

$$\ln EMP = 1.037 \ln GDP + 1.457 \ln DIS - 0.966 \ln WAG \quad (3)$$

(117.2) (14.2) (-31.7)

$$R^2 = 0.88 \quad SSE_r = 11.3 \quad t_{0.05(197)} = 1.65$$

根据回归的结果,可以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作如下解释,当其他条件不变时,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原本可以带来就业的较快增长,但是由于工资收入在 GDP 中比重下降以及平均工资水平上升,导致就业增长速度远小于经济增长速度。

(三) 收入分配与总需求结构

在我国总需求结构中,投资需求比重呈上升趋势,而消费需求比重持续下降。2005 年消费需求在 GDP 中的比重为 51.9%,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相比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以上。而 2005 年投资需求在 GDP 中的比重为 42.6%,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相比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投资比重高出 20 个百分点,而消费比重低了

20 个百分点, 总需求结构失衡的问题非常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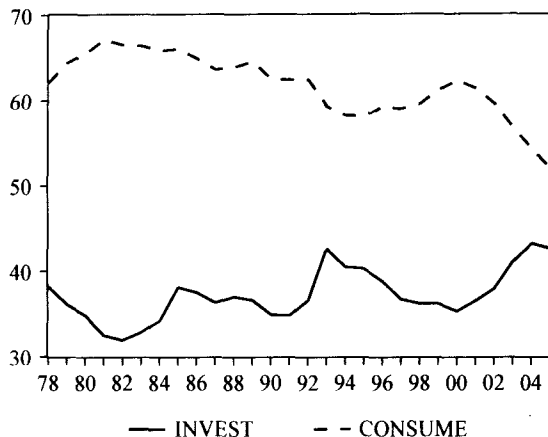


图 2 1978—2005 年 GDP 中投资与消费所占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06 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应当看到,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 伴随着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 投资在总需求中占有较高的比重有一定的必然性。但是, 长期以来, 经济增长对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 导致了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比例失衡, 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 导致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工资总额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下降, 而利润、折旧与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上升, 这必然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这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总需求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投资需求。由于本期增加的投资虽然增加了本期的收入流量, 但最终将直接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 这又使得资本存量相对于收入流量的比重提高, 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中利息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而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相应下降, 从而使消费需求进一步下降。由此, 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总需求结构失衡形成了循环累积的作用机制。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国内生产总值的项目结构, 我们计算了 1996 年以来劳动者报酬 (WAGE)、营业盈余 (PRIFIT)、利润 (TAX) 和固定资产折旧 (DE) 在 GDP 中的比重变化。由图 2 可以看出, 劳动者报酬在 GDP 中的比重持续下降, 2005 年已经下降到 40% 左右, 而营业盈余大幅上升, 2005 年与 90 年代末期相比, 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折旧和生产税的比重平稳上升。这说明功能性收入分配结构越来越倾向于财产性收入者和经营性收入者, 而越来越不利于工资性收入者。

我们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功能性收入分配对于总需求结构的影响。以消费在总产出中的比重 (C) 为被解释变量, 以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 (W) 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方程 (4)。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消费产出比的滞后项, 以消除自回归因素的影响。

$$C_t = a \times W_t + b \times C_{t-1} + \mu_t \quad (4)$$

利用 1997—2003 年全国 31 个省区的面板数据, 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C_t = 0.28 \times W + 0.64 \times C_{t-1} \quad (5)$$

$$(16.02) \quad (11.15)$$

$$R_2 = 0.40 \quad DW = 1.90$$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使消费在总产出的比重提高 0.28 个百分点。

(四) 产业结构形成的累积效应

产业结构是产出和就业的载体,我们分析产业结构的目的是为了通过产业将收入分配、需求和就业联系起来,从而提供一个不同于总量分析的视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取决于需求结构,而需求结构取决于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决定了平均的工资水平和行业之间的工资水平差距。在产出既定的条件下,产业结构是决定就业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的情况可以概括为,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需求结构进而产业结构向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倾斜,这些行业创造的产值高,工资收入高,但吸收就业的能力不强,而且会导致行业之间工资水平差距的增加,这是收入分配差距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通过产业结构,在收入分配、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就业之间形成了累积循环效应,造成了城镇富裕阶层和其他阶层之间的逐步分化。

(五) 对外贸易依存的小国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的发展在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中的确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贸易依存程度不断上升,从 1986 年的 25% 上升到 2005 年的 64%,出口的贸易依存程度也由 1986 年的 11% 上升到 2005 年的 34%,而进口的贸易依赖程度也由 1986 年的 15% 上升到了 2005 年的 30%。通过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国际比较,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主要的发达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在战后均有明显的上升。这反映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更加紧密,使贸易自由化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日本和德国,自战后恢复时期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一时期贸易依存度的上升尤为显著。但是,总体上来看,中国外贸依存度远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

第二,中国是唯一具有小国贸易特征的经济大国。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一国外贸依存度的高低与其国民经济规模的大小呈负相关。即小国国内市场较小,为了消除这一制约,促进经济的增长,小国往往大力发展外贸,外贸也就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大国由于人口众多,国内市场规模更大,通过发展内需也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外贸依存度持续上升,而其他大国的外贸依存度虽然有所上升,但是上升的幅度并不是很大。尤其是 2000 年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大幅度攀升,到 2005 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达到了 64%,使中国成为了具有小国外贸依存度特征的大国。这反映了中国内需与外需之间结构失衡的问题。

我国贸易依存度的显著上升,与我国实行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有直接的关系。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为了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依靠对外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是东亚经济实现高增长的共同特征。大力发展出口加工行业的产业政策,出口退税等形式的贸易政策,严格地钉住汇率政策对于扩大进出口贸易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对外贸易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是,我国对外依存程度的不断上升面临各种潜在的外部风险,给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是一个外贸依存度高的大国,而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进口以关键零部件、设备以及能源为主的结构型问题又说明中国同时是一个贸易弱国。处于这种地位的中国与其他贸易强国相比,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中国上述外贸结构性问题所带来的风险也是结构性的。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依存度高不仅会限制我国对外开放的回旋余地,而且容易在主要贸易伙伴内部形成针对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集中容易使出口国陷入“比较利益陷阱”,即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被长期固定化。同时我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高,所以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对就业的影响特别重要。国际市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和国内就业具有较高的影响。

三、经济高速增长的理论实证

本文的第三部分将从理论模型和实证经验两个方面论证经济高增长方案的可行性。在理论部分,依据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构建了经济稳定增长模型,说明在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资产报酬率、金融结构、收入分配状况和资本形成等因素。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所作的回归分析验证了模型的结论。模型的意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视角,以说明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以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为分析和解释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率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理论模型表明可以通过调节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因素,实现由一种稳定增长状态向另一种稳定状态的转换。这为构建一个经济高增长方案提供了基本思路。

在高增长的实证部分,我们主要考察了东亚经济的一些特点。东亚经济保持了 30 年以上的经济持续增长,完成了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实现了落后经济对先进国家的赶超。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东亚模式的特征。总结和归纳东亚经济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经验,对于实现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有重要意义。

(一) 稳定高速增长的理论模型

本文的增长模型吸取了古典假设,从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入手,结合了凯恩斯的收入—支出等式(收入为 $C+S$) (凯恩斯, 1983) 和马克思的收入—支出等式(收入为 $C+V+M$, 流量化后相当于 GDP 统计的 $W+D+R+\pi$) (马克思, 1975)。模型包括银行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收入支出表(损益表),把经济增长率和总资产报酬率(ROA)、收入分配结构、投资消费结构、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相联系,与卡尔多事实达成一致。在一个封闭经济中,简化掉政府部门,则收入—支出模型可以表述如下:

$$W_t + D_t + R_t + \pi_t = C_t + I_t = \text{GDP}_t$$

左边的收入也是产品的总供给价格,前三项为企业成本,右边的支出表示总需求。下

标 t 表示时期。在企业成本和消费支出不变时，当期利润增长，企业家会增加下期投资，扩大产出；而投资增加，又导致利润增长。

企业部门

企业部门负债为 L ，所有者权益为 E ，企业长期的资产负债率为 β 。根据资产负债表的平衡原则，企业的资产总量为 $(L+E)$ ，分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实物资产用 K 表示，占总资产的比例为 ϵ 。戈德史密斯（1993）定义的金融相关比率为某一时期一国全部金融工具的市场总值除以该国有形国民财富总值，这里定义为企业的金融资产值与实物资产值的比例，用 f 表示。则：

$$f = \frac{(L+E)-K}{K} = \frac{K/\epsilon - K}{K} = \frac{1-\epsilon}{\epsilon}$$

$$\epsilon = \frac{1}{1+f}$$

银行部门

银行按照固定的资产抵押比例发放贷款，设这个比例是 α 。那么企业会得到多少贷款？企业贷款扩张过程有些类似于银行的货币创造。所有者权益为 E 的企业可以获得 αE 的贷款，于是资产、负债各增加 αE 。但新增的 αE 的资产没有抵押过，所以可以用来再次获得 $\alpha^2 E$ 的贷款。这个过程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企业于是最终可以获得 $\alpha E/(1-\alpha)$ 的贷款。这笔贷款就是货币数量 M 。可见，长期货币数量与企业资产值是成比例的。企业之间的应收账款在加总后相互抵消，假设不存在企业债，货币为企业负债的唯一形式，贷款不归还，定期按利息率计利息，则货币数量就是企业负债。

$$M_t = \sum_{i=1}^{+\infty} \alpha^i E_t = \frac{\alpha}{1-\alpha} E_t = L_t$$

这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

$$\beta = \frac{\frac{\alpha E}{1-\alpha}}{E + \frac{\alpha E}{1-\alpha}} = \alpha$$

即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最高可以达到资产抵押贷款的比例。或者说，银行确定一定的抵押贷款比例，就限定了企业最高的资产负债率。如果抵押贷款比例太高，企业资产负债率就会过高，增大银行的风险。

为便于分析，再加入以下几个假设：

假设一：长期中存在稳定的折旧率 d 、利息率 r 和利润率 i 。

这是卡尔多事实第三条的拓展。“统一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是马克思表明的企业竞争条件（马克思，1975），是古典经济学的经典假设，是企业资本逐利而流、自由进出的宏观后果。在资本市场条件下，则取决于股票持有人的“用脚投票”，由此导致的股价变动使“平均利润率”更快地实现，表现为市盈率的一致。这里的利息率是债权资本

的报酬率。当期利息 R 为上期企业负债 L 和利息率的乘积, 当期利润 π 为上期企业所有者权益 E 与利润率的乘积。折旧 D 为折旧率乘以实物资产。设企业的总资产报酬率为 ρ 。

假设二: 工资收入和利息、利润收入间收入分配的比例是不变的, 即工资和利息、利润和的比例不变, 用 θ 来表示。

这是卡尔多事实第五条。可以理解为工资作为可变成本在收入 (产品价格) 中要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 或根据资本和资本成本得到利息利润收入后, 工资按固定比例加成, 得到企业总成本 (产品价格); 也可以认为是劳资双方的博弈结果。 θ 在这里也表示功能性收入分配的差距, 即 θ 越大, 功能性收入分配差距越小。

$$\frac{W_t}{R_t + \pi_t} = \theta$$

假设三: 工资的储蓄倾向为 s'_w , 利息和利润的储蓄倾向为 s'_c , 总储蓄率为 s' 。

稳定的储蓄倾向的假设来自凯恩斯 (1983), 而按阶级划分不同储蓄倾向则是新剑桥学派的经典假设。这里不同收入成分的划分仅仅是功能性的, 而不是严格按照阶级来划分的, 因为在资本市场发达, 股权分散化的今天, 工人也持有公司股票; 而资本家也大多变成“支薪经理人”。特别地, 这里并不假设工资储蓄倾向小于利息和利润储蓄倾向, 也不假设工资和利息、利润的储蓄率不变。只假设总储蓄率不变, 这可以从卡尔多事实推论出来, 也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长期经验事实。

$$s' = \frac{s'_w \theta + s'_c}{\theta + 1}$$

上式中, 卡尔多 (1956) 的分配理论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储蓄倾向和投资率 (储蓄率) 决定功能分配, 而本文则是在储蓄率 and 功能性分配已定条件下, 利润利息和工资的储蓄倾向被动决定。收入分配的分析以功能性分配为主是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在存在严格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 利润和工资对立的条件下不失为一个简化, 但在今天已不再适用。利用收入越高则储蓄倾向越高的凯恩斯假设 (1983), 我们可以得到总的储蓄率与规模收入分配正相关。用 η 表示规模收入分配, 则:

$$s' = F(\eta) \quad F'(\eta) > 0$$

即收入分配差距越大, 总储蓄率越高。这与美国 (分配差距小, 储蓄率低) 和发展中国家 (分配差距大, 储蓄率高) 的经验事实一致。转型国家的增长普遍以高储蓄率 and 投资率为特征。

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之一 (凯恩斯, 1983): 储蓄等于投资。

$$\begin{aligned} s'_w W_t + s'_c (R + \pi)t + D_t &= I_t \\ (1 - s'_w)W_t + (1 - s'_c)(R + \pi)_t &= C_t \end{aligned}$$

推论一: 收入—支出模型中的各项流量都将与资本存量 (企业总资产、所有者权益和负债) 成稳定比例, 如资本产出比等。各项流量、存量都成固定比例。这样, 各项流量和存量的增长率一定相等。

如，设净投资为 I'_t ，可以得到净投资与消费比为储蓄率与消费率之比。

$$\frac{I'_t}{C_t} = \frac{s'_w W_t + S'_c (R + \pi)_t}{(1 - s'_w) W_t + (1 - s'_c) (R + \pi)_t} = \frac{s' (\theta + 1) (R + \pi)_t}{(1 - s') (\theta + 1) (R + \pi)_t} = \frac{s'}{(1 - s')}$$

定义投资为实物资产的增加值加当期折旧，即：

$$I_t = \varepsilon^* (L + E)_t - \varepsilon^* (L + E)_{t-1} + D_t$$

$$\text{且, } I_t = s'_w W_t + s'_c (R + \pi)_t + D_t$$

由以上可以推出：

$$[\varepsilon + s' (\theta + 1) \rho] (L_{t-1} + E_{t-1}) = \varepsilon (L_t + E_t)$$

又有前述：

$$M_t = \frac{\alpha}{1 - \alpha} E_t, \text{ 可得:}$$

$$g_M = g_E = g_{L+E}$$

由此，可以得到均衡的经济增长率和货币数量增长率：

$$\begin{aligned} g_{GDP} &= s' (\theta + 1) (1 + f) \rho \\ &= (s'_w \theta + s'_c) (r\beta + i - i\beta) / \varepsilon \\ &= g_{L+E} = g_E = g_L = g_C = g_I = g_W = g_D = g_R = g_\pi = g_M \end{aligned}$$

这个比例即是均衡增长时所有者权益的稳定增长率，由于所有流量（GDP、工资、折旧、利息、利润、投资、消费）和存量（货币数量、企业负债、总资产、所有者权益）都成固定比例，所以它们的稳定增长率也等同于这个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就是稳定状态的均衡经济增长率。这个增长率与利息率、利润率、企业资产负债率、实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收入分配比例、高低收入者的储蓄倾向有关。这可以解释卡尔多事实的第一条。同样，卡尔多事实的第六条可以用均衡增长率的这些决定因素的国别差异来解释，即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来自于企业 ROA、收入分配差距、储蓄率和金融相关比例的差异。

由于 f 、 s' 和 θ 恒为正，所以增长率的符号取决于总资产报酬率的符号。若总资产报酬率为正，则增长率为正；若总资产报酬率为负，则经济负增长；若总资产报酬率为零，则经济不增长，这类似于马克思（1975）的简单再生产。这里，经济增长的原因是利润，企业家为了获取利润而投资、生产，并最终通过资本转投获得统一的报酬率。总资产报酬率为正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利息率可以看作是企业的外部（间接）融资成本，而利润率则是企业的内部（直接）融资成本。可以看到，融资成本与经济增长率成正向关系，在融资成本较低的国家，则经济增长率较低。戈德史密斯（1993）发现，在金融发达国家（通常也是经济发达国家）中，融资成本明显低于欠发达国家。而融资成本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大小与企业的融资结构有关，即按照各自的融资比例加权。如果一个国家利润率较低，利息率较高，则更重视间接融资的经济增长率较高。